

中国·北京语言学院

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 讨论会论文

1993.8 北京

目 录

说“礼拜”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之一例——	张清常 (1)
主谓谓语结构的语义模式	张旺熹 (15)
普通话字音的异读与正音对策	崔希亮 (30)
会意汉字内部结构的复合程序	石定果 (43)
略谈港台、大陆词语之间的差异	李振杰 (54)
“儿”尾构词功能综述	李 明 (68)
意大利人学汉语的难点之一	
——结果补语问题——	马箭飞 (88)
从两部文学名著看现、当代汉语词语的差异	王绍新 (100)
外国人学汉语的语法偏误分析	鲁健骥 (117)
汉语研究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法	
——方言、古汉语和共同语的比较研究例说——	陈亚川 (133)
说“它”	施光亨 (146)
“一边 A, 一边 B”的内部语义关系分析	王弘宇 (159)
现代汉语独字音节说	张 晋 (171)
谈非视觉信息的培养	
——基础阶段汉语阅读教学探讨——	王碧霞 (185)
建立“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的基本设想	
.....	储诚志 陈小荷 (193)
语言是不是知识	陈贤纯 (206)
论写作对语言学习的深化	吴振邦 (219)

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的展望

- 再谈汉语教材的编写原则……………刘 珣(234)
- 语言能力模型和语言能力测验……………张 凯(252)
- 未来高级阶段汉语基础课教材的框架构想与设计
- 兼谈《高级汉语教程》得失及其他……………倪明亮(264)
- 说话训练的理论基础……………杨惠元(279)
- 基于功能思想的组合式教材刍议……………孙德坤(299)
- 短期对外汉语教学的新趋势及我们对教学特点的
再认识……………卢晓逸 朱子仪(312)
- 颜色词所体现的文化反差……………熊文华(327)
- 数字“七”的文化解码……………张德鑫(341)
- 中国艺术中的文化精神……………赵永新(356)
- 《交际文化》编写指导思想
- 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问题的若干思考
……………林国立(367)
- 汉学和西方汉学世界……………阎纯德(378)
- 从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转换上造就高层次外国汉语
专门人材……………郑春苗 许树安(393)
- 汉语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基本类型……………郑艳群(401)
- 论来华留学生中文办公自动化基础课的设置……………卢湘鸿(416)
- 外国人学习与使用汉语情况研究……………高彦德 李国强 郭旭(426)

说“礼拜”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之一例

张清常

汉语的时间词语，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许多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分别进行研究。

我在1990年试图从汉语史、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汉外对比三个方面综合起来探索这个问题。王海芬女士正在从古代汉语角度进行，而且早有积累。我们商量过合作。显然，我年岁大了，又忙乱，只能敲敲边鼓；由她写出论文若干篇，编纂汉语时间词词典，这样构成专著。后来王显先生也参加编纂。这两位研究员在这方面都有长期的积累，合到一起，这本专著是非常扎实的。让我随便写点什么，只要跟汉语时间词语有关，作为代序，就算交卷。

为了藏拙，我在汉语时间词语之中，选了个小而又小的、无关大局的两个字：礼拜。它是又古又今，又汉族又国内少数民族，又中又西，亦历史，亦宗教，亦文化，各方面都沾点边儿的。以礼拜为话题，略抒己见，还掉一件所欠文债吧。

—

请看下列语言现象：

语言	一周之内七天的名称和次序						
	1	2	3	4	5	6	7
汉语	甲 星期日, 星期天, 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乙 礼拜日, 礼拜天, 礼拜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丙 (用甲或乙)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周末
英语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日语	日曜日	月曜日	火曜日	水曜日	木曜日	金曜日	土曜日

这里面有一些问题:

一、从汉语来看,

1. 书面语和在正式严肃场合讲话用星期日及一至六这一系列。若不太拘束,可用星期天。

2. 口语和在比较随便的情况下,年纪比较大的人会很自然地说礼拜天及一至六这一系列。可能说礼拜日,但就比较不自然些。其实礼拜天、礼拜日及一至六这一系列,在20世纪1912年以后到50年代以前,反到是时常说的。最明显的例子是,20世纪初期,在上海的文学流派中有个“鸳鸯蝴蝶派”,又名“礼拜六派”,因为这派有个定期刊物叫做《礼拜六》,曾风行一时。

3. 近年新兴的说法有周一至六这一系列的,而且可以把星期六称为周末,日刊的许多报纸有“周末版”更起了推广 weekend 这一汉译名的作用,又有若干名为《××周末》的小报。星期日还没有被周日顶替。“宣传周”早已流行。

4. 这些说法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乃是由国外引进的。星期,在中国指的是织女星与牵牛星每年七夕相遇,这是民间永恒的爱情故事之一。因此古代把男女成婚之日叫做星期。不了解这一点,按照现代的观念去读中国古典文艺作品,就很可能理解为:要么,中国古代星期天都十分欢乐而我们现在星期天要比上班儿还累。要么,中国古代结婚都在星期天。礼拜,在中国上古是指以礼相拜。中古才解释为致礼于所信仰的神佛。拜真主上帝的礼拜要在七世纪及以后才传入中国。周,在中国是周而复始,在时间上没有规定。

现在把一周定为七天,这是由国外引入的。人们向往的“五日工作制”,认为是世界上最文明先进的,乃是以七天一周为基础来计算的。中国从距今 2200 年的西汉起,一直到中国的封建王朝结束,按法律规定,更是五天一休息,官是十天一休息,西晋的法律规定,一年之内还可以请六十天假。这些都是官样文章,实际上是自由自在。辛亥革命(1911)以后废除。

5. 指出星期、礼拜并非中国原有,做到这一步还算比较容易;说出星期、礼拜是怎样引进的,怎样会成为汉语现代常用的时间词,这可不那么轻松。本篇力求把这说清楚,但头绪纷繁,说清楚也难。有一些问题我还解决不了,只能提出一些设想。若能做到使人理解为什么可以说:

礼拜天做礼拜。 星期天做礼拜。

不可以说:

礼拜天做星期。 星期天做星期。

这就算本篇把它说清楚了。至于礼拜怎么会变成汉语的时间词,又怎么换成七天,怎么排出次序,又怎么换成星期……这些,我只能提一些设想,不知是否能够成立。

二、从英语来看,

1. 英语一周七天的名称,乃是诸神之日。Sunday 是日神之日,Monday 是月神之日,Tuesday 是战神之日,Wednesday 是德国神之日,Thursday 是 Thor 之日,Friday 是 Frig (Odin 之妻)之日,Saturday 乃是农神 Saturn 之日。这些神有不同的来源,怎么会聚到一起?这些神的先后次序为什么这样排?以及有关的其他问题,我都茫然不了解。我以异国人之无知,加上我的英语水平很低,只能看出:七位神之中没有耶和華或雅赫維,没有耶穌及其门徒。虽然《圣经》讲了上帝第一天到第六天做了什么,第七天休息,因此把休息的这天称为上帝之日,但是从英语这七天的名称,看不出次序来。反而是 Saturday 明确表示这是最早的世界主宰之神 Saturn

之日。间接来表示的，乃是 Sunday，日神之日。日神在希腊神话，是 Jeus，在罗马神话，是 Jupiter。都是 Saturn 以后的世界主宰之神。

2. 这每周七天，哪天是第一天？英语的 week 有两解；一是七天，包括六天“就业日”和一天“安息日”。一是六天，不包括 Sunday，也就是不包括“安息日”，这个 week 等于 weekday。英语 weekend 是周末，是 Saturday，中文是星期六、礼拜六、周六。这样就把一周的下限定住了。英语一般词典对 Sunday 的解释是：1) first day of the week. 2) Lord's day. 更明确、更形象的就是使用英语的月历表以及近年在中国风行的“挂历”，对每周七天的名称排了次序：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但是，西方国家也有另一种排列，把 Sunday 作为第七天，例如德语的月历表。中国人是勤劳的，信奉基督教和其他教派的现在很少，懂得基督教义、教史、教规的也不多，绝不会去琢磨每周这七天是“安息日”在先呢？还是“就业日”在先呢？是先休息后干活呢？还是先干活后休息呢？

三、从日语来看，

1. 中日友好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交往几千年，文化上面的相互影响很深。以一周七天这件事为例，中国对于一个月之内的时间安排是以十来算的，因此安排了上中下旬，阴历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下旬长短差一天，不计较。官员休息，安排了上中下浣。小吏则五日一休息。从西汉到清朝，官样文章的法律条文如此规定下来不变。虽然中国与基督教有三次因缘，中国封建王朝从未考虑过安排一周为七天。上中下旬和上中下浣不是主要障碍，不接受的原因后面再说。中国引入一周七天是通过日本而学来的。

2. 基督教的七日为一周，以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为名的七天，由于头一天是日神之日 Sunday，第二天是月神之日 Monday，日本采用中国上古七曜、七政的办法，依序把

西方诸神名改为：日曜日、月曜日、水曜日、火曜日、木曜日、金曜日、土曜日。这个办法非常巧妙，也非常自然，进入日语，通过赴日的中国留学生传入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即付诸实施。

四、再从汉语来看，

1. 辛亥革命以后，按照新制度，纪时就要有所修正。不能再用宣统年号，改为民国若干年。（当时议论的方案很多，有主张用黄帝多少多少年的，有主张用孔子诞辰多少多少年的，因为有若干具体困难未解决，例如孔子的生年与诞辰，学者争论不休，故未采用。但这些主张的思路是跟“纪元”一样的。）一周七天的名称，却有中国自己的一套叫法。日本的叫法，确实用过，我小时候上学，学校公布的“功课表”就是月、水、火、木、金、土代表今天的星期一至六。我还记得：①日常用的是礼拜几，②日语的日曜日改称礼拜日或礼拜天，排在第七天。那时对于礼拜天仍在工作学习，辛苦之际发牢骚说在过礼拜七。③称为礼拜，可能与基督教的教堂称为礼拜堂是配套而命名的。

2. 按中国人口的比例来说，基督教徒的入数是非常少的。由于“教案”给予中国人血淋淋的刺激，由于列强给予中国人的深刻教育，某曜日也罢，礼拜几也罢，在中国人的情感上都有难以承受之感。作为旁证，我举钱玄同先生在1930年给我们的一次讲课为例。他谈到“华北、华南、华西、华东”这些字眼，是列强所制造的。称华北则中国之北端被划到长城以南，长城以北非中国所有；称华南则中国……”。先生之言，使我顿悟。抗战期间，一听到成都有由某方命名的华西坝，使人难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力强盛，国际地位提高，华北等字眼似乎减少了刺激性。然而直到今天，中国的国内外事务的处理中间仍有若干微妙的、只可意会不可以言传的那么点儿什么，仍是按照列强当年制造华北等字眼的蓝图方案来对付中国的。使有骨头的中国人刻骨铭心，何况在辛亥革命之后，国耻日多，国难益重，当时中国人民只接受一

周七天，而冷淡不欢迎带洋味儿的名称，是可以理解的。

3. 因此，有了新的创造。日月及水火木金土星都是太阳系的星球，用以标明一周七天这种时间观念，七曜的活动有一定时期的周转。从这样的思路来考虑，就在汉语中产生了星期这个词。同时让开了 Sunday 日曜日、礼拜日的独特性，称它为星期日，其余的为星期一至六的系列。既使顺序一目了然，又免去其他味道，所以受到欢迎，成为公认的正式名称。

4. 中国何时开始使用星期这个词。这个问题，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寄谦先生告知：1912 年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南京临时政府公报》自第一号起至第十一号，均题为民国元年某月某日，例如第十一号为二月九日。自第十二号起，开始注明星期几，例如第十二号为二月十日星期六，第十三号为二月十一日星期日，第十四号为二月十三日星期二。政府公报为国家最高级文件之一，1912 年 2 月 10 日为星期见于中国政府公报最早的日期。

5. 近年开始流行的周一至周六、周末，可能是适应人们求简和喜欢双音节有关？比照与它们配套的往往把 Sunday 说成星期，就一律是两个字、双音节。

以上是我的假设，甚至只能算是猜想，请多指正！

下面开始探索礼拜怎样由礼节逐步演变成为时间词语。

二

中国上古，人们为了表示尊敬对方，以礼相见，那时要拜。又因等级尊卑、关系亲疏、性质吉凶的差异，而有种种礼拜之法。要求符合礼仪而拜，这才是礼拜，否则便成非礼非拜。

根据考古材料及古代文献，商周的王及重臣的典礼名目繁多，仪式复杂琐碎，又多禁忌。恐怕是由巫、史、宰之类的人物来制订礼仪，儒家就托之于周公。还要有高级官员，例如《周礼》所说的大司徒、大宗伯，专门掌管礼仪训练工作的执行与监督。要按照这些规

定来进行，非有专门的训练和经常排演学习不可。儒家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礼为首，恐怕就是这个原因。从西周至春秋五六百年，这些礼节已经形成了“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儒家《礼》经（即《仪礼》）就是这种礼节单子，学习应用礼节的“手册”。

礼已经是西周以来社会的传统秩序和体制，作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遵守的通则，所以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礼。把礼作为社会准则，要“立于礼”。而且把仁的伦理道德与礼结合起来，“人而不仁如礼何？”让人们自觉遵守礼。荀子这一派特别重视礼，汉代儒生出自荀子这一派的较多，他们把祖师所讲的礼仪的道理和深层的涵义整理起来，便是《礼记》。汉高祖打天下时侮辱儒生，得天下之后就用叔孙通这帮儒生订礼仪，来约束臣民。礼节跪拜乍一看是“繁文缛节”，实际上是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则和手段。

儒家之礼，十分复杂，于是从各种不同角度来看，有不同的说法。例如：大司徒所掌管的礼有四种，祀礼、阳礼、阴礼、乐礼。大宗伯所掌管之礼有五种，吉礼 12 类、凶礼 5 类、宾礼 8 类、军礼 5 类、嘉礼 6 类。这是以《周礼》为依据，综合古代文献来说的。清朝学者邵懿辰《礼经通论》综览《仪礼》，验以《礼记》，认为礼只是八项：冠、婚、丧、祭、朝、聘、乡、射。祭就包括祭祀礼拜天地鬼神（而且是多神）祖先。

拜是礼的表现形式之一，周朝时就有九种：稽首顿首拜、顿首拜、空手拜、振拜、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这些讲求，过于烦琐，后代实际上已经自然简化（直至取消，代之以鞠躬、握手等简便的方式）。

就中国本土而言，儒只是家，是学，不是宗教，乃是一种传统意识形态。康有为等提倡建立孔教而得不到响应，正在于人们并不认为儒是一种宗教，而它的影响与势力之大，在封建社会中是能与佛教、道教等抗衡的。

所以儒家的礼和拜，是两个单词。是依礼而拜，不是宗教仪式

的动作。

下面开始涉及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礼拜。我既不信任任何宗教，也没有研究过它们的教义与宗教仪式。本篇只是从语言角度说礼拜。

道教产生于东汉后期。最初流行于民间，带有宗教性质，有巫术，有神仙术，也有盛行于西汉的黄（帝）老（子）学说的某些思想。以后逐步发展，有系统的教义，有经典（后来集为《道藏》）以及有历代杰出的人才，也有若干教派，势力大的时候能左右当时的政治。大致在隋朝以后，道教已成为被统治者所崇敬信奉而又利用的宗教，道教佛教的消长沉浮都与王朝有关连。

这里只谈礼拜的问题。三国西晋时，道教发展为天师道。东晋中叶至南北朝初期，天师道在南方的注重经法义理，在北方的注重礼拜功德，清理道规。北朝寇谦之改革道教，严格斋戒礼拜。后来道教也形成一整套的礼拜仪式，例如，参星礼斗，所参拜的星主要是太阴星（即月亮），斗是北斗及南斗。还有步虚参斗，这步虚还要吟唱步虚词。要彻夜不眠，守庚申，拜月上百次，走步成千次。设醮祈祷，道士礼拜非常辛苦。

道教在充实发展教义教理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所以儒道虽各有所礼拜，而两种礼拜矛盾不大。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博士弟子景卢受月氏王使者口授浮屠（佛）经，这是佛教由西域传到中国的开始。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公元 65 年）遣使赴西域求法，佛法在中国开始传播。洛阳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寺院。寺本来是中国古代中央机构和官署，据说僧徒万里远来，暂住寺内，不幸病逝，遂将该寺赐与僧徒，从此佛教庙宇称为寺，与中央机构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光禄寺等并存。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中国历史上也极为重要，不必多

说。

佛教对于礼拜，也是重视的。当然，佛教自己的礼和拜，不同于儒与道教。例如：合什、合十（又称合掌），两手当胸前，十指相合，表示敬意，是佛教沿用印度的礼节，带到中国。再如：佛教的经典与一般记载常说的顶礼膜拜，也叫顶拜。顶礼是跪在地上，以头承尊者的脚，这是佛教徒的最高敬礼，后来作为一般的敬礼，或作头面礼足。膜拜是合掌加额，伏地跪拜。这原是我国古代西北部少数民族对尊敬者或所畏惧者的礼节。佛教礼拜与儒道矛盾非常突出。

可能由于在我国中古前期，道教与佛教都重视礼节跪拜，所以礼拜这两个字经常连用，逐步由礼和拜两个单词，演变为一个复合词。例如《世说新语·排调》：“何次道住瓦官寺，礼拜甚勤。”旧题班固（疑为后人伪托）《汉书·武帝本纪》：“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至于道教佛教后来某些宗派不大重视礼拜，例如金、元之丘处机，南宋之道济（俗称济公），另外是一回事。

道教的庙宇叫做观、宫等，例如白云观、长春宫。佛教的庙宇叫做寺、院、庵、等，例如法源寺、清水院、白衣庵。道与佛的宗教建筑成千上万，名称各异，但绝对没有用礼拜这两个字。叫做礼拜寺的不是佛教的庙宇。道与佛的宗教建筑命名，采取修饰性词语+观/宫/寺/院/庵等的办法。

伊斯兰教于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中国称之为回教、天方教、清真教。广州有唐代的伊斯兰教建筑，名为怀圣寺光塔，所以怀圣寺俗呼光塔寺。有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重建怀圣寺碑》。福建泉州有至正（1341—1367）年间吴鉴所撰《清净寺记》，是伊斯兰教的寺。

北京宣武区牛街清真寺，建于辽圣宗统和十四年（996），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重修。寺名在辽，在明英宗时叫什么，我不知道。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白纸坊有礼拜寺。据此,牛街清真寺那时名叫礼拜寺。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大加修缮,改名清真寺,它是在北京,历史最悠久而且规模最大的清真寺。

北京东城区东四清真寺,始建于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御题“清真寺”。

伊斯兰教的庙宇,其命名最初似乎是跟道与佛的办法一样,例如唐朝命名的怀圣寺。元朝命名的清净寺,明清命名的清真寺,这清净、清真就是“清净无染”、“真乃独一”、“真主(安拉)原有独尊,谓之清真”,揭出教义了。至于命名为礼拜寺,就是以伊斯兰教“五功”之一来命名了。它可以集体举行,可以单独举行。举行的时间也有许多种,与基督教的礼拜显然不同。

就区别这一清真、礼拜寺与另一清真、礼拜寺来说,办法是在前面加个地名,例如牛街清真寺,东四清真寺。这是与道、佛庙宇命名法不同,而与基督教的办法差不多。寺名叫做礼拜寺,可见礼拜之重要。这与基督教叫做礼拜堂一样地重视礼拜。

附带说一下,1),西安清真寺《创建清真寺碑记》,题为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所立。这是一块明朝人伪托的假碑,现代史学家陈垣已予以否定。2),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开封清真寺有《重建清真寺记》碑文,清康熙二年(1663)又立同名的一块。这清真寺乃是以色列人传入中国的犹太教,是基督教而非伊斯兰教。

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在唐朝,《唐会要》卷四九,玄宗天宝四载九月诏曰:“波斯教经,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今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唐明皇诏书大意是,基督教堂叫做波斯寺,这个名称欠妥,改为大秦寺。首都长安和东京洛阳立刻就改,各地若有,也照改。

基督教第二次传入中国在元朝。《元史·顺帝本纪》：“至元元年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礼，从之。”那时基督徒在中国所建教堂叫做十字寺，因为教堂正面顶端中央竖有醒目的十字架。

基督教堂叫做波斯寺、大秦寺、十字寺，这样命名的办法与道教佛教的相同。

明朝时由以色列人传入中国开封的基督教堂，竟然叫做清真寺，这是很奇特的。可能由于基督教跟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中国的信教者对于新鲜的外来事物认识不足，泛用美好的词藻来表达，所以都选了清真寺这个名字。

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是耶稣会士利玛窦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入居广东以后，逐渐立住脚跟。后来清朝康熙时虽然因为礼拜的问题造成冲突，鸦片战争以后，基督徒在中国的人数仍大量增加。天主教、正教的出家人聚居的寺院称为修道院，天主堂等，耶稣教、新教的寺院称为救世军、青年会等。公众所熟悉的基督教的寺院都被称为礼拜堂、教堂。

礼拜堂、教堂这种名称就显然区别于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一个地方有几个教堂，就在礼拜堂、教堂之前加上地名，以示区别，例如北京西什库礼拜堂/教堂。还可以省称为堂，前面加方位词，例如北京有南堂、北堂。昆明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个因文林街而得名的文林堂。南堂与北堂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此外，南堂销售的葡萄酒有名，而北堂的血浓于酒。

礼拜这两个字，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单词，开始于中古前期，与道教佛教有关系，但这两教都没有拿礼拜作为宗教建筑的名字，也没有把礼拜作为宗教仪式中的特殊名称。

伊斯兰教的基督教都在自己的宗教建筑加上礼拜二字，一个叫礼拜寺，一个叫礼拜堂。后来到了清朝，伊斯兰教称清真寺。基

基督教则在明末、清朝、民国都使用礼拜堂这个名称，在书面与口语中流传，影响很大，尽管近年常用教堂二字，人们还是知道礼拜堂的。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极为重视做礼拜这一宗教仪式。虽然两教的礼拜有种种差异，礼拜这个词在现代汉语是有特殊涵义的，给人印象很深。道教佛教的宗教仪式在近代汉语不叫做礼拜而叫“做功德”、“做功课”。“功德无量”这话早已不含宗教气氛，新“学堂”小学生做功课也不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基督教《圣经》载有七日一周，其中六日工作，一日休息。新教一般是在“主日”进行集体活动，做礼拜，在礼拜堂举行，其内容有祈祷、唱诗、读经、讲道等。基督教遵循犹太教的“守安息”，而大多数教派将“守安息”这一规定改在 Sunday 举行，因此 Sunday 在中国称为礼拜日。

这样，礼拜就由基督教的宗教仪式，转为基督教“主日”Sunday 的时间词。为了区别，把时间词的礼拜，再加个“日”；加也可，不加也可。Monday 到 Saturday 依次加一至六，这样构成一周七天。作为口语使用，曾与星期、星期日、星期一至六并行。星期则毫无宗教仪式之义。因此，可以说：礼拜日/天做礼拜，星期日/天做礼拜；不可以说：礼拜/天做星期，星期日/天做星期。

三

儒家的传统意识形态所重视的礼和拜，在中国历史上似乎与道教的礼拜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矛盾。首先发生冲突的是儒与佛教。

从南北朝到隋唐，儒与佛教的争辩，除了教义，也争礼拜的对象问题。往往皇帝站到佛教这一边，予以保护，梁武帝本人甚至出家，当然不能真去做和尚。从 5 世纪到 9 世纪，儒与佛教一方面冲突，一方面和解。

1934 年陈寅恪先生开设“佛经翻译文学”课。大师授徒，举重

若轻，潇洒自如。他很平平淡淡地说了这样一句话：目连救母的故事，是中国化了的佛教故事，它反映出佛教徒考虑到中国的孝道问题。老师一句话，对我是极大的启发。可是陈先生并不在意，没有为此写文章，我在六十年后写在这里，以表怀念！

基督教三次传入中国，而以第三次的影响为最大。

17 世纪末，来华的基督教徒已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儒家思想。例如比利时人柏应理(Philipps Couplet 1622—1692)等撰《中国箴言》(1662)，开始将《大学》《中庸》《论语》节选译成拉丁文。与人合作于 1687 年修订改名《中国圣人孔子》，内容是《大学》《中庸》《论语》均为全译，增加孔子小传。此书似未引起西方注意。

明末清初来华人耶稣会士，从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起，他们首先苦学汉语，兼习文言文，极力与中国人接近，翻译和撰写介绍西方天文、历算、地理学、物理学以及语言学的著作。尽管不完全是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中最精萃的东西，却对中国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耶稣会士带来钟表等物，帮助制造火药，测绘地图，观察天象，很受重视。中国不但授与较高官职，皇帝还时常召见他们。由于他们比较了解中国，他们传教及吸收基督教徒时，重在做人的品德，而不拘泥于礼拜问题，允许中国的基督教徒保留中国的习俗，对于中国信徒重视祭祀天地君亲师，拜祖先，拜孔子，并不干涉。由于耶稣会士善于调和中西矛盾，减少摩擦，于是康熙六年(1667)，中国当时十余省和北京共有教堂 159 座；康熙三十九年(1700)，在中国的基督教徒已达 30 万人，主要是耶稣会士。

基督教来华较晚而又打不开局面的其他教派，纷纷向罗马教皇指控耶稣会士这一派丧失立场。罗马教皇于 1704 年 11 月 20 日发布教皇命令，宣告：中国人祭祀天地祖先，崇敬孔子，纯属偶像崇拜，应予严禁。康熙四十四年(1705)，罗马教皇派高级僧正铎罗到北京通知康熙相应照办。康熙对于使者以礼相待，反复解释中国敬奉祖先、崇拜孔子的道理，并指出罗马教皇无权对中国人民制订法

令。康熙四十六年(1707),铎罗在南京发布文告,驳斥康熙,并下令处分不肯执行教皇命令的基督教徒。康熙立即将铎罗驱逐出境。康熙五十七年(1718)重申,允许耶稣会士继续留在中国工作及布教,其他西方人士不得在华停留。雍正二年(1724)及乾隆十二年(1747)均令除在北京为中国工作者外,其余皆不得在华停留。罗马教皇于1773年将中国耶稣会解散,以严肃教规。

上述事件引起西方人士的思索,为什么中国会跟西方因为礼拜的问题而如此决裂。于是纷纷开始研究中国的礼仪,翻译儒家经典,研究孔子。例如钱德明(Jean Joseph Amiot 1718—1793)又名王约瑟,所撰《孔子传》(1786)颇为详尽,甚至把孔子家谱一直记到乾隆时的衍圣公。西方进而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等方面,钱德明还写了一本《中国兵法研究》(1772)。西方的“中国学”研究遂由漫长的萌芽状态进入逐步成熟阶段。礼拜问题之事竟促进西方“中国学”的长足进展,既出乎人意料之外,又在于事理之中。

自从康熙四十四年(1705)中西双方因礼拜问题发生争论,事情已过了288年。中西双方的变化都很大,相互的理解亦已加深。例如1912年中国政府引进一周七天的安排,又如礼拜这个词由宗教仪式转为汉语的时间词,而且在书面上改为“星期”。

但是1705年关于礼拜之争,不只是礼仪问题,真正的核心问题乃是康熙坚决反对“强加于人”。这一点,似乎西方对之仍不以为意,尚未总结经验。西方研究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下过苦功,作出成绩。对孔子,也给予较高评价。但对《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这一段话,似乎也没有注意到它的深刻涵义和它的潜在影响。例如孙中山的演讲提到它,孙中山还亲笔写了“天下为公”的横幅。中国近现代老一辈的革命家脑子里也有这一段话的影子。可能在三礼之学里,礼仪跪拜只是末节,其精华尚待研究哩。